

世界史中的臺灣史

——學術生涯回顧



黃富三（臺大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編按：

本文原為黃富三老師於2011年5月19日應邀在本系發表之退休演講，後經黃老師增修，收入由林玉茹女士主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之《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2012）。惠承臺史所同意轉載，謹此致謝。

人生如「白駒過隙」，一晃已是七十老翁了。回首前塵，自覺無何所成，但承蒙同事的厚愛，2010年9月，臺灣史研究所為我舉辦退休研討會（黃富三教授榮退暨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歷時三日，中外學者雲集，場面壯觀，令我永銘難忘。2011年5月，臺大歷史系又邀我發表退休演講，不少舊雨新知撥冗參加，我既感動又慚愧。我因為想不出甚麼好題目，就談談自己的學術生涯與幾點心得。如今臺灣史研究所擬將研討會論文結集成冊出版，力邀我寫一篇學思歷程，爰以此演講詞為藍本修正為本文，一者因應所內同仁之要求，二者算是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做個小結。

孔老夫子說得好：「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我的新解是：「可以亂講話，沒人敢怎樣。」我就抱著這個態度來聊聊自己的過去。

一、求學、教學及研究生涯：必然或偶然

以前很多歷史學家常爭論「歷史是必然的，或偶然的」，但沒有結論。我會走上歷史學，也曾想研究西洋史或世界史，最後卻落腳臺灣史，為甚麼？似乎必然、偶然都有。

（一）由臺灣史至西洋史

我會走上歷史學這條路，可能跟從小就喜歡看章回小說有關係吧！中學時，我的記憶力超好，國文、歷史幾乎都是班上第一。可是我原本趕時髦，考進臺大外文系，卻又因喜歡看雜書，英文又不好，挨不住，到了三年級選擇轉系。那時社會學剛引進臺灣，我相當著迷，曾有意嘗試，最後因歷史系師資陣容堅強而轉入。

1965年我考進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口試師長陣容浩大，從院長到系主任、相關教授均駕臨。我記得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教授（1896-1977）問我要研究甚麼，我那時還不太清楚研究所與大學部的區別，很緊張，不知怎麼答。正好那年暑假，我在舊總圖書館參考股無意間翻看了《臺灣府志》，驚訝居然有臺灣史著作，而自己卻一無所知，就順口說想多瞭解一點臺灣史。但進研究所後，第一年只是忙著修課程，仍然未定下研究方向與題目。



1966 年，大約是 6、7 月間，正好教育部留學考有西洋史學門公費生，我被同學推派去參加，竟幸運考上了。此次考試，在當時居然是大事，電視報導，報紙訪問，讓我飄飄然，幼稚地自以為很了不起。依規定，通過留學考試第二年就要出國，我原本想既然出國研究西洋史，就放棄臺大的碩士學位吧！不過，楊雲萍老師（1906-2000）力勸我完成學位再出國。我勉為其難，1967 年，在短時間內寫了〈劉銘傳清賦事業與土地改革研究〉，據說是第一篇臺灣史碩士論文。這埋下我日後任教、研究臺灣史的根源。

1967 年 9 月，我申請到劍橋大學歷史研究所（Faculty of History）。我進入的 college（與美國式不同，我譯為學舍）叫做 University College，後來改為今名 Wolfson College。當時它是個僅收研究生的新 college，同學不多，彼此都認識，很有一體感。而且外籍生比例甚高，很國際化，讓我可以接觸不同國家、民族的人，拓寬眼界。有一次，一位愛爾蘭室友突然問我：「為甚麼你經常說『We Chinese 如何如何』，我要知道的是你個人的看法。」我愣住了，第一次發覺中國人或華人的自我中心與集體化意識的確很強。

我當時懷著「富國強兵」，建立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的夢想，去研究英國工業革命。我攻讀的學位是 master of letters（簡稱 M. Litt.。按：牛津、劍橋的 MA 不是用讀的，而是畢業生可以透過教學、研究申請取得，或授予應聘至該大學教書的教授們，原為中古之專業師傅之意）。由於工業革命的研究

已經很專，我後來選擇較少人做的題目“The Female Workers in the British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紡織業女工〉）。然而，我無法二年內寫出論文，拖到第五年方提出。提論文之前，原本歷史所安排換指導教授，即經濟史講座教授 Professor Joslin，藉此我可以直接申請 Ph. D.。未料不過一個月，他便因心臟病去世，我乃換回原來的老師。經過此一插曲，口試過後只通過 M. Litt. 學位。後來，學校曾要求我再留一年修正論文，college 亦願提供一年獎學金，並容許同時工作。我當時因體力、精神已瀕臨極限，堅持要回國，乃結束留學生涯。

（二）由西洋史、世界史重回臺灣史

1972 年 9 月回國，1973 年方正式進臺大歷史系擔任講師，任教西洋史課程。開過的課包括西洋上古史、歐洲近代社會經濟史、西洋文化史、世界通史等，任教的系包括歷史系、考古人類系、外文系，以及歷史系夜間部的同類課程。我出外時不時有不同職業的人說修過我的課，原因在此。

1977 年，楊雲萍教授退休，他開授的「臺灣史」是全臺灣唯一的，他希望我接，以免香火斷絕。我因已習慣教西洋史，又久未接觸臺灣史而婉拒，但經不起他和鄭欽仁教授等人的逼勸，於是斷斷續續開了臺灣史的課程。

當時，我的課橫跨東西，左右夾攻，備起課來很辛苦。不過，這也迫使我將臺灣史與世界史、西洋史拉上關係，增進其廣度，亦是一得。



世界史中的臺灣史——學術生涯回顧

（三）臺灣史研究的起點：女工至洋行

在研究方面，在臺灣研究西洋史並不容易，我除了發表一篇有關英國紡織業的論文外，都集中在臺灣史。至於主題的選擇，不少是由於偶然因素。

我回國後，發現老家關渡的店舖，每天工廠下班後擠滿購物或郵寄物品的女工（因代辦郵務），門口的公共電話也排著打電話的長隊。原來她們是新設的臺塑工廠等雇用的大批女工。由於我在劍橋研究的是英國工業革命時的紡織業女工，靈機一動，思考是否研究成果可以應用於臺灣。感謝哈佛燕京社的贊助，我在 1974-1976 年完成《女工與臺灣工業化》一書。這可說是我做英國工業革命之紡織女工研究的臺灣版，也可算是臺灣女工研究的先驅。附帶一提，當時研究勞工問題仍是禁忌，第一年很感謝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的協助，居然讓我獲准進入高雄加工區做調查。第二年，透過我太太政大同學張忠本（臺大歷史系張忠棟教授之弟）之助，獲得遠東紡織公司少東徐旭東允准，至

該公司做調查。還有一件趣事，某日我讀到某位勞工專家一篇臺灣女工的文章，論述內容與我的書很像，很訝異，最後讀到「黃富三的意見與我相同」一語，不禁啞然失笑。

接著我研究洋行，因緣是 1979 年我再訪劍橋，在大學圖書館讀到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檔案，內有臺灣相關之資料，一時手癢，乃進行抄寫工作。由於不甚熟悉當時的手寫與用詞，相當費力費時。後來我太太也去，一起輪流抄。因為資料難得，而洋行又少人研究，我回來後決定開始研究清季臺灣洋行。我先著手於較容易處理且較早設立的洋行，因此寫了幾篇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的論文。這應該是臺灣利用檔案研究洋行的開端，其後葉振輝、黃頌文等人也去劍橋蒐集資料，各自發表其成果，深信這一部分未來應該還有發揮的空間。

（四）霧峰林家研究耗去大半時間

我本來要向國科會提出新的洋行研究計畫，但只寫了幾篇文章後，約在 1984 年，被霧峰林家的後代林正方先生找去寫霧峰林家的歷史，而臺大土木研究所王鴻楷及其團隊則調查研究林家建築。這是因林正方先生看到美國學者 Johanna Menzel Meskill 教授寫了一本霧峰林家的書，¹也想寫一本中文的林家歷史著作。由於林先生說他的手頭上無資料，於是要求至少提供林獻堂日記才能寫，因此林獻堂之孫林博正影印一份給



▲黃富三老師演講風采（2011 年 5 月 19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¹ Johanna Menzel Meskill,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我。令人意外驚喜的是，我與臺大土木研究所合作研究的過程中，陸續發現大批的林家文書、地契，以及其它年份的林獻堂日記、玻璃底片等。然因資料太豐富，原本計畫一年寫完的書，被迫須分年分冊撰寫，至今已出版《霧峰林家的興起》、《霧峰林家的中挫》、《林獻堂傳》等書文。希望第四冊書在不久的將來亦能問世。

我從事霧峰林家研究的意義，不僅在於出版幾本著作，更重要的是，喚起學界對臺灣文書、檔案等資料的重視。以往不少臺灣史作品流於抄襲、人云亦云，以致不為學界所認可，現在已全然改觀。附帶一提的是，我所撰之霧峰林家的三本書先後都有人以巧妙方式剽竊。當然，學術著作原本希望有人引用，但絕非侵用，但願臺灣史學界與文史工作者自我約束。

（五）研究二二八的因緣

我在英國之所以選擇研究工業革命，不外乎「師夷長技以制夷」，期待未來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與列強一爭長短。還有，我到英國後，發現臺灣並未落後多少，而臺灣人（或中國人）比英國人勤奮，也不笨，深信一定可以迎頭趕上。我不脫當時的流行想法，認為中國之落後都是帝國主義害的，因此常批評列強，尤其是與近代中國關係最深的英國。有一次因中共鎮壓西藏並爆發中印邊界戰爭，英國人支持西藏、印度，我就痛批英國帝國主義干預內政，但被反問「西藏人是華人嗎？」又說：「你罵英國統治印度是帝國主義，那華人統治西藏人就不是嗎？」我愣住了，只含混辯說：「西藏自

古是固有領土。」但我事後非常不甘心，決定蒐集資料，找機會扳回一城。於是，從十九世紀歐洲史追到希臘、羅馬、中古、近代政治思想史，沒想到我的氣勢反而越來越弱。因為我發現原來中國人基本上仍承襲秦漢至明清的專制帝國與華人中心思想，而西歐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歷經數變，已經蛻變為近代以人權為基礎的自由、民主社會。加上我在這五年與不同國家同學相處的經驗，逐漸體認建立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才是世界和平之基與人類之福。於是，我由極端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轉為自由民主的忠誠信徒。

我回國後，目睹身歷臺灣政治、社會的巨變，由威權走向民主，其中 1987 年之解嚴更是分水嶺。一般來說，學界多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專制傳統根深蒂固，民主幾乎不可能出現於中國，臺灣在短短幾十年竟然不流血地達成民主，讓我這個深知近代世界民主奮鬥血淚史的歷史學者既驚訝又興奮。然而，我也發現這些表面的改革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那就是族群猜忌與國家認同。1991 年，行政院回應社會要求，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期能探究事件真相，我與賴澤涵（召集人）等五人應邀擔任執行小組成員。我從英國回來後，一直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問題的總根源，有如心臟病，不徹底治療，臺灣無法長治久安，因此義不容辭地答應了。令人欣慰的是，1992 年 2 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後，社會大眾雖不同意，但可接受。其後政府也對悲劇之發生道歉，並立碑紀念，甚至成立基



世界史中的臺灣史——學術生涯回顧

金會，對受難家屬進行補償工作，這些作為可說跨出了族群相互瞭解與官民和諧的第一步。我深信今日臺灣不經流血成為民主國家的經驗，已打破「華人不適合民主政治」的成見，未來將成為影響華人世界的典範。我作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信仰竟能在有生之年實現，何其幸運！何其欣喜！

由於二二八研究的開端，我也斷斷續續涉入戰後歷史的研究。如先後參加檔案管理局推動之二二八檔案與美麗島事件檔案的採集工作。在調查、交涉檔案移交過程中，幸蒙各單位的厚愛、協助，居然取得不少外界以為消失的檔案；國史館已出版不少其中之相關檔案，成為學術論文之重要材料。我自己雖忙碌，但也發表幾篇有關二二八與美麗島事件的文章，也算是另一類的成果吧！

（六）創設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因緣

1992 年（可能是 12 月），張光直院士突然打電話找我，並造訪我家。原來中研院可能會成立臺灣史研究所，他希望我去接籌備處主任一職。我那時因太太剛過世，而且對行政事務也不甚有興趣，因此婉辭，並推舉他人。張院士稱，目前臺灣史學界老一輩學者的年事已高，而我算是比較資深的，又任教臺大臺灣史課程多年，理應出任。我答應考慮。不久，不知消息如何傳出，中研院、臺大不少人先後來勸，我因而寫信告知張院士，願意出任。這是 1993 年我從臺大歷史系調任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主任的由來。

由於我欠缺行政經驗，做起事來相當棘手，幸虧臺史所前身是「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原本就有一批研究與行政人員。他們

主動協助，由下而上幫我很多忙。另外，當時臺史所之創立爭議仍多，幸虧諮詢委員均一時之選，又有張光直副院長之全力支持，總算安度草創期風風雨雨之難關。

籌備處成立前，「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原本就已進行古文書之採集、臺灣文獻之數位化工作，甚有意義，我自然延續並加重其工作，也有甚佳之成果。我做的比較有長遠性的事，是初步確立發展方向，即社會經濟史、族群史、殖民地史。當時因籌備處規模小，不像研究所有「組」的編制，因此先成立研究群，做為同仁切磋與發展之平臺。未料，中研院後來廢「組」而成立研究群，或許是巧合吧！如今本所研究群已增加文化史、環境史二群，並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差堪自慰。

從以上簡歷，約略可看出或必然或偶然之歷程，我從臺灣史出發，通過西洋史、世界史，又回歸臺灣史。這算不算另類的「鮭魚返鄉」呢？至少因為這個經歷，讓我瞭解臺灣史的發展深受世界史的影響，而其所以如此，又與臺灣的地理條件與歷史經驗有關。以下我談一下這方面的感觸，就教各方先進。



▲黃富三老師退休演講現場座無虛席



二、教學、研究有感

退休後，回首前塵，或許可以發抒一點教學、研究的感想，那就以「世界史中的臺灣史」來談談吧！

（一）獨特的地理條件影響臺灣歷史：

孤島 vs. 寶島

空間是歷史發展的舞臺，臺灣有二大地理特色深深影響其歷史發展。

1. 山與水：多樣化的氣候與地形，農業潛力大

臺灣島位於東亞地震帶與颱風帶，島民長年遭殃，然而也有二大優越的地理條件。第一、氣候方面，因北回歸線經過臺灣中部，南為熱帶，北為副熱帶，而地勢高聳，山區為溫帶、寒帶氣候，因此生態極富多樣性。再者，由於是熱帶島嶼，高溫多雨，動植物易於繁殖，也因而可以生產不同氣候帶的作物，提供豐富的生活資源。

第二、地形方面，它是新褶曲山地，地勢高聳，其形狀則南北長而東西窄，東高而西低，平原位於西部。中央山脈縱貫全島南北，有如乳母，提供豐富水源，而溪流有如血管，輸送養分滋養大地。臺灣的重要河流有淡水河、大甲溪、大肚溪、濁水溪、曾文溪、高屏溪等，其流域即發展為精華區。

臺灣因擁有各種不同地形與氣候，農業條件優越，因此十七世紀後，出現「農商連體經濟」，因應市場需要，生產不同農產品，維持著長期性的經濟發展。²

² 參見黃富三，〈17世紀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收入陳益源主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

2. 島與海：開放與進步

臺灣是島嶼，四面環海，因此是既封閉又開放的。如果鎖國，它是封閉的孤島，而本地資源有限，難以進步繁榮。如果開放，則可利用海洋與世界各地往來，吸收、利用他人的資源，反而進步更快。

其次，臺灣原為東亞文明區的邊陲，因此經濟與文化相對較落後，但因位於東亞航線的中心點，當十六、十七世紀航海時代來臨後，地位頓形重要。1624 年荷蘭人統治臺灣後，採取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開放政策，乃啟動了快速發展的機制。又因擁有各種不同地形與氣候，農業條件優越，出現「農商連體經濟」，奠定本土自主經濟的基礎。直至 1960 年代後，方轉為工業為主的經濟。

3. 早期社會：東亞孤島與自足經濟

荷蘭人領臺前，原住民與外界往來不多，臺灣基本上處於「自足經濟」階段。原住民以狩獵、捕魚、初級農業維生。³十七世紀末，來臺採硫的郁永河仍指出北臺原住民之食、衣、住等經濟物資均自產自用，內稱：「番人……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預計也。……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屋必自構，衣需自織，耕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為網，屈竹為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為而

頁 121-142。原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與金門技術學院合辦之「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0 月 23-24 日。

³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p. 170.



後用之。」⁴此充分顯現其自足經濟之特色。

至於對外關係，由於臺灣位於東亞航線要衝，亦有硫磺、沙金，因此有中、日商人時而來往貿易。明代建國後，厲行海禁政策，至 1567 年，福建巡撫塗澤民方請開海禁，⁵施行「船引制度」，允許本國船隻自漳州海澄縣的月港出海，進行東、西洋貿易。十六世紀後半，已經有漢人來臺貿易。⁶1602 年來臺之陳第所撰的〈東番記〉載：「（福建）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⁷可見華人早就與臺灣原住民交易土產。

除華商外，日商自十六世紀末年後也相當活躍。1592 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頒「御朱印狀」予出海船隻，拓展海外貿易，更多日商活躍於東亞各商港，臺灣亦在其中。⁸

然而，基本上臺灣只是被動的交易對象，並無主體性。外來商人定期或不定期來

臺進行以物易物之貿易，對本島經濟無何影響，有如候鳥，來得再多也不會留下來生育繁殖。因此筆者比喻為「候鳥期」經濟。⁹

（二）近代世界史促成臺灣的興起：

從經濟史角度看

然而，1624 年荷蘭人統治後，在短短不到四百年內，臺灣何以有飛躍式的進步呢？考其根本原因，實與荷蘭人所實施的重商主義有關，特別是 1630 年代臺灣出現之「農商連體經濟」，而這又與近代世界的全球化有關。我分成二大階段來談。

1. 第一波全球化與臺灣的興起：大航海時代

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來臨後，在葡萄牙與西班牙主導下，出現第一波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世界型資本主義。但至十七世紀時，荷蘭取而代之，成為最先進的海權國，向各地擴張商業勢力；1602 年，設立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nnigde Oostindie Compagnie，簡稱 VOC），經營亞洲貿易。1624 年荷蘭占領臺灣後，在今日安平建商館，推動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因而啟動了臺灣的重商傳統。¹⁰

首先，荷蘭人以安平為轉口站，設立商館，推動三角貿易。當時東亞最有價值的商品是中國的絲、日本的銀、南洋的香料，臺

4 郁永河撰，方豪輯校，《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44 種，1959；1697 年原刊），頁 35。

5 張燮，《東西洋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131。

6 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 45；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35-36。

7 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閩海贈言》（「文叢」第 56 種，1959；1629 年原刊），頁 26-27。

8 〔日〕山崎繁樹、野上矯介，《1600-1930 臺灣史》（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頁 21；另參見〔日〕川島元次郎，《德川初期の海外貿易家》（大阪：朝日新聞社，1916）。

9 黃富三，〈17 世紀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收入陳益源主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1-142。

10 黃富三，〈臺灣的商業傳統：自荷治時代至清代〉，收入謝雲生、吳美惠編，《吳大猷院長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94），頁 327-339。



灣位於三地之中央，乃轉口貿易的適當據點。¹¹在亞洲商館中，其獲利亦僅次於日本商館。此期因東印度公司派人常駐商館，貿易乃規律化，其規模亦擴大化，我稱之為旅舍型（Hotel）經濟，較前期之候鳥型貿易則大有進步。

接著，1630 年代荷蘭人進一步發展貿易導向的農業，尤其是糖業。荷蘭人之發展臺灣農業，並非原始規劃，而是因應當時貿易環境之變化而採取之對策，即生產甘蔗與稻米之必要性。荷蘭人領臺初期，主要靠轉口貿易與鹿產之出口，然而，二者均有其侷限性，無法成為長期經濟發展的支柱。絲產品在轉口貿易上受制於華商之手，來源與價格無法掌握，獲利不穩定甚至不佳。¹²

臺灣鹿皮是另一項重要商品，在日本具有極大的消費市場。因此荷蘭人領臺後，即鼓勵出口鹿皮，每年有數萬張輸出。1636 年後，臺灣長官改為發狩獵執照予漢人。漢人以陷阱與套索式獵法，效率提高，鹿皮產量大增，品質亦較佳，¹³因此出口量大增。但也因過獵，影響繁殖，導致鹿口大減。1639 年，臺灣長官決定以每年 7 萬張為限發照。¹⁴此證明受制於鹿之自然繁殖力，鹿

皮之產量有其限制，難以成為牟利之重要而穩定的商品。

荷蘭人深知糖有國際市場，原先自華南輸糖至臺，再轉銷日本、中東、歐洲等地。來臺後，發現安平港背後有廣大的嘉南平原、鳳山地區，其地形、氣候宜於植蔗，於是鼓勵漢人來臺拓墾，蔗糖、稻米業興起。至 1630 年代後，農產品逐漸取代鹿皮、絲品而成為最重要出口商品，農業與貿易結合為一體，我稱之為「農商連體經濟」。¹⁵米、糖乃植根於臺灣本土之產業，具有自主性與永續性，筆者名之為定居型（House & Home）經濟。

其後，明鄭與清朝沿著此一路線發展，但有二點值得注意：第一，米、糖為主的農商連體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成為臺灣經濟的骨幹。第二，稻米的重要性逐漸壓倒蔗糖而為第一大出口品，其中 1700 年代後之水田化運動最具關鍵性，臺灣成了中國的東南穀倉。

2. 第二波全球化與臺灣的壯大：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生產力大增，交通工具更大幅進步，尤其是汽船之出現，象徵新海權時代的降臨，因此出現第二波的全球化。西方憑船堅砲利與雄厚的經濟力大舉東來，執行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政策。臺灣孤懸海外，自然成為列強覬覦之地，傳統的米糖經濟遭遇危機。然而，洋商

11 曹永和，〈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 1-36。另外，印度的棉布亦很重要，但與臺灣較無關係。

12 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頁 117。

13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 255-257。

14 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 261-262。

15 黃富三，〈十七世紀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收入陳益源主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1-142。



世界史中的臺灣史——學術生涯回顧

之來臺設立洋行，亦將臺灣產品銷往世界，反而成為新契機。

十九世紀後半，臺灣經濟面臨危機，至少有二因。第一為傳統產業的極限。至十九世紀，大平原已經開發殆盡，只餘零星之地。第二為市場因素。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後，五口通商，洋船自東南亞運米銷往中國，臺米遭遇競爭，臺糖亦因大陸糖之增產而受威脅。

危機亦是轉機，臺灣被迫做產業轉型。十八世紀後半葉，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大幅提高生產力，它亟需市場消化其產品，亦需進口生產所需之原料，因此全力向世界擴張，產生工業資本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中國、臺灣先後被迫開港通商。新海權時代來臨後，臺灣由於位居東亞航線要衝，又因產煤而受列強矚目。此外，山區特產樟腦、茶亦是重要國際性商品，二大產業乃崛起。

臺灣盛產的樟木，可為木料、船料，亦可熬製樟腦。樟腦原本用於防蟲、製香，印度的需求很大；後來用途逐漸擴大，甚至成

為製造無煙火藥、賽璐璐、膠捲的原料。當時世界上只有臺灣、日本生產樟腦，其中盛產樟木的臺灣是世界最大的樟腦供應地，臺灣樟腦成為國際上半壟斷性的商品。

由於臺灣未開放通商，英商需要樟腦，因此常來臺私自交易。1858-1860 年開港後，因應世界市場需求，臺灣樟腦之出口量不斷增加。在 1864-1895 年間，出口金額自 70,464 元激增至 3,571,932 元，增幅近 50.7 倍。臺灣樟腦在世界市場上具支配性地位，出口量較另一樟腦出口區的日本為大，¹⁶具有半壟斷性質，可說是一高獲利產品，裨益山區經濟甚大。不少人因此而致富，如霧峰林家、黃南球家族等。

茶業亦在 1858-1860 年開港後，由於洋行之向世界市場推廣，快速發展。英商 John Dodd 於 1864 年至淡水考察樟腦，1866 年攜帶安溪茶苗來臺，並貸款農民栽培、製作，再將茶葉運銷澳門、美國，是拓展臺茶外銷的功臣。至遲在 1867-1968 年間，艋舺、大稻埕已設廠製茶，此即 Formosa Oolong（臺灣烏龍）之起源。由於美國、歐洲市場大幅擴張，山區紛紛改種茶樹。但臺茶也因外銷情況大好，茶農競種而過剩，且有摻假



▲此次演講暨茶會有多位學界老師共襄盛舉，已自政大歷史系退休的張哲郎老師（左立者）是黃老師在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的同學，即現場分享黃老師的小故事。

16 黃富三、陳慈玉，〈商業的發展〉，收入黃富三編，*《臺灣近代史：經濟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頁 334-335；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Yokohama Kelly & Walsh, 1903), p. 442;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清代臺灣之貿易與外國商業資本〉，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4），頁 115。

情形，商譽受損、市場萎縮。臺茶原本即送福州混製為包種茶，1881 年，同安茶商源隆號吳福老來臺精製，並銷往東南亞。因此，包種茶與烏龍茶並列為二大出口茶，量價俱增，凌駕閩茶。因茶業而獲利者除洋行外，尚有買辦出身的李春生與板橋林家等，茶農的生活亦獲得改善。

總括言之，在出口品中，茶增加速度最快，在 1868-1895 年間取代糖而為首要出口品。至於樟腦與煤之出口量，大致上呈現波動狀態。¹⁷由於茶葉大多產於北部山區並由淡水港出口，對北部經濟生活之影響特大，故美記者 James W. Davidson 指出，北臺之榮枯取決於茶業之盛衰。¹⁸

由上可見，臺灣的發展深受世界史的左右，而只要開放通商，臺灣就能以其多樣的地理條件生產具有市場性的產品，創造新經濟。在 1895-1945 年日本之領臺，與 1945 年至今中華民國之治臺，均持續地印證此一特點，雖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產業。

三、結語

最後，略抒個人對學術生涯的幾點感想。

一、臺灣是個不大不小的島嶼，其歷史發展深受世界局勢的影響，尤其近代臺灣經濟之快速躍進，是在世界全球化的挑戰下之結果，因此臺灣史之教學、研究必須與世界

史結合。然而，臺灣亦賴本身優勢之發揮方能生存，因此其歷史極具特色，必須深入探討。唯有宏觀與微觀雙管齊下，方能瞭解臺灣史演變的機要。

二、臺灣經濟已進入穩定發展的成熟階段，今後應朝創新文化、維護生態環境的方向發展，建設一個有品味的美麗島，方不負上帝賜予的好山好水。

三、臺灣一方面深受中華文化的薰陶，一方面吸收歐美日文化的優點，因而創造出世界唯一的華人民主政體，具有典範價值，今後應持續地扮演領航者的角色。

四、臺灣是個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排除異己將分裂、內耗，因此各族群應敞開胸懷，互相尊重、寬容，互補長短，以創造一個百花盛開的新臺灣世紀。

臺灣雖小，但有山有海，地理條件良好，五臟齊全，而人民聰敏勤奮，可過安居樂業的生活。我身為其子民，何其幸運，今雖已退休，仍願以餘年奉獻給它，與大家共同雕琢一顆閃閃發光的「東亞鑽石」。



▲演講結束後，甘懷真主任（右）代表全系師生致贈黃老師「教澤永垂」紀念牌。

17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晚清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8），頁 2-3。

18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p. 394.